

近现代(实践)哲学的物性与人性的对立 ——对当代生活意义缺失的一种追问

孟宪清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0871)

摘要:一些现代西方学者认为,当代生活意义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代社会的工具理性的膨胀发展。造成这种社会精神状况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是,西方传统观念中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事物的价值意义仅仅归结为作为绝对主体的人,而忽视自在自然或“人化自然”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说、康德的绝对先验理性、费希特的自我和非我的关系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等。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认为,整个社会实践,包括道德、语言交往和生产劳动,都是主体和主体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因而都是相对的主体和客体,语言交往根源于生产劳动,二者共同创造了“人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人”,从而成为生活世界意义的最终来源。

关键词: 实体本体论; 实践哲学;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7)01-0024-04

哈贝马斯在论述马克思的劳动实践观念的时候曾经说过,社会基础作为一种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社会资源的“瓶颈”的隐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各种社会资源的“瓶颈”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转换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具体来说,在原始社会,社会基础指的是人们的血亲关系和人口的生产 and 再生产;在农业社会,社会基础表现为以人的血亲家族为核心的统驭和整合社会结构的政治力量;在工业社会中表现为商品经济,而在当代“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中,社会基础表现为生活意义和价值。

那么,在当代社会中,作为社会基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为什么出现缺失?这是哲学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所谓当代社会指的是西方发达社会和受其影响和牵动的具有“信息化”、“后工业”等特征或趋向的社会。因此,当代社会生活意义缺失问题必须首先在西方传统社会及其思想发展史中寻找。

我们家乡有句骂人的话,如果指责一个人无情无义,就说:“你这个人的良心被狗吃了?”。对上述这个哲学问题的症结,我们也可以用来进行概括,那就是:在西方传统社会和思想发展史中,物性被人性或主体这条“狗”给吃了!

我们知道,在工业社会以前的自然经济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中,由于社会文明程度的低下,社会结构、知识结构和人的行为结构的分化程度的低下,在

人的现实世界中,呈现一种物我不分的状态,人的思想具有泛神论的普遍性质。也就是说,在生活世界中,物性和人性不是一种后来的西方社会和思想中的客体和主体的关系,而是两者相互融合渗透的关系。当然,如前所述,由于人的实践能力的有限性,这种在思想中的现实被表现为一种实体,即它与人的行为活动不是一种相互建构和渗透的关系,这种实体的性质是不会因人的行为发生变化的。同样,它对人的行为也不构成性质的改变,两者是一种单纯的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这种实体观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构成世界之砖”的具有客观性质的物质原子或质料,另一种是成为世界自我发展的最基本的有机内核——生物性的种胎。这两种实体观在中外思想史上都是非常普遍的,只不过在工商业和农业经济并立的西方社会的思想中更多地表现为“世界之砖”,而在以畜牧业和农业经济为主的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中更多地表现为“世界的种胎”。

在西方的古希腊时期,物性和人性并不是对立的和具有等级关系的,它们都是作为实体的具有客观存在意义的“逻格斯”和“奴斯”被创造的个体和表现者;人虽然能够利用自然来达到自己既定的目的,但有保护人以外的万事万物的责任;对于自然来说,人不是主体,而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和自然存在的意义和根据,不在于两者,也不在于人的实践,而在于作为实体的客观精神——逻格斯和奴斯。在前苏格拉底时期,逻格斯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搜集和整

理,二是言说和谈论。同时,作为语言,逻格斯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精神的显示者,通过语言的主体间性的交流而达到对实体性的客观精神的理解和洞见,奴斯,就是理性,这种理性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也主要是一种客观精神,而不是一种后来的构成人的主体性的本质的主观精神。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传统哲学逐渐转向以建构人的社会主体性为目标的以个体为实践主体的主体性哲学或理性哲学。智者派的高尔吉亚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把哲学沉思的目标由客观精神的逻格斯和奴斯转向了人本身。苏格拉底则强调“知识就是道德”,把主体的本质主要归结为理智逻辑,显露了哲学逻辑中心主义倾向。柏拉图的理念说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归结为先天和天赋的先验理念,理念不但存在于作为无限实体的上帝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与先验理念相对立的世界上的具体的万事万物,则只是分享客观理念的东西,也就是说万事万物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来自于它们自身,而是来自于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理念,而人本身由于具有理念,所以,人必然成为高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的主体性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更是进一步把自然看作是只供具有理念形式的人的实践的无生命的东西。

创造是人的行为的本质特征。中外思想史上的创世说无不建立在具有人格特征的上帝或其他什么神灵的对自然和人的创造活动上。但基督教的创世说更具有西方社会所特有的主体(理性)哲学的特征,或者说,基督教的创世说和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理性学说、实践学说,共同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物性和人性对立的思想基础。

据说在16-17世纪在西方社会中开始出现“主体”意识的普遍化,这种社会意识是伴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社会制度的法治民主化等形成的,是在其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一系列社会思想文化运动中逐渐形成的,按照后现代思潮的说法,这些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是建立社会“主体”的合理性的过程,是一种通过社会力量的强化和排斥的双重性质的过程,既是对人(主体)的解放,同时也是对人的异化过程。

在西方近现代思潮的人性对物性的排斥中,最明显的是传统唯物主义哲学,虽然它强调自然的物性的客观存在,但是它把物质(如水、土、原子、一般物质)看作是作为哲学实体或世界观基础的“世界之砖”,把物质看作是无生命的东西,人的精神分立的互不转化和渗透的东西。而各种唯心主义虽然强调人的精神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量,强调精神对物质的渗透和创造,但是,作为创造物的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仍然来自于精神,而不是自在的物质和物性。与传统唯心主义的这种思想基本一致的是,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企图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实现经验与先验、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等等二元对立,但是它们的实践观仍然是建立在主体(理性)哲学基础之上的,这种实践的核心理念的核心就是主观精神的对象化,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在作为实践结果的现实观念中,它所强调的现实的意义和价值来源不是自然的物性,而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精神。无论是“自然的人化”,即强调人的精神因素和力量对自然的渗透和改造,还是“人化的自然”,即人的肉体感官的理性化和社会化,它所强调的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主要来源于“人化”,人的理性和精神,而不是“自然”即自在的自然的物性。康德的先验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他的先验认识论把事物的规律、性质归结为人的先验意识,是人的先验意识赋予事物以意义和规律;他的道德哲学也是把道德行为的价值看作是道德主体为实现道德的绝对律令而应尽的义务,其审美行为(游戏)的意义在于实现“无目的的目的”,不是自在自然的目的,而是审美主体的主观目的,因为在康德看来,自然本身无所谓目的,它只存在一种客观的因果联系。这里的问题是,康德把自然和人为、先验和经验割裂开来。实际上,不但人化自然渗透着人的主观精神和目的,而且自在自然也有对人的生存意义、自己的生存意义和权利。因此,康德强调人不但为自然立法,为道德立法,而且为人自身立法。在这里,人的这种绝对化了的先验的意志和价值要高于自然、人的道德行为本身和人的感性的日常行为的意义和价值。

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逻辑体系中,不但自在的自然,而且作为个体的人都居于次要的地位,现实存在(包括人化自然和个体的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最终来源和根据就在于作为社会历史整体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实体化了的“绝对理念”。黑格尔的道德哲学包含着他的整体历史哲学之中,他除了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自决之外,特别强调道德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主体认可和服从绝对理念支配下的历史的客观规律;黑格尔的美学范畴也在于“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其审美的最终价值无疑主要在于社会主体性的绝对理念和个体的精神自由活动,不在于人以外的其他事物,当然也包括自在的自然。

在后现代社会及其哲学思潮中,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主要的实践样式已经不是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实物性商品生产及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行为,而是在主体间性的游戏的基础上对语言符号的操作,就是利用知识和信息进行商品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在

这里,自在的自然已经越来越成为人化自然,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符号化。在这种符号化的游戏中,自然及其物性已经越来越远离商品化和符号化了的现实(包括人)的价值和意义。

从总体上来说,当代分析哲学等科学或客观主义思想和传统唯物主义、其他传统哲学客观主义在人和物性的关系上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把自然看作是僵死的无生命的东西,语言符号的结构和规律完全是无生命的、纯粹客观的,无所谓价值和意义的,这些结构、规律和人的行为生活只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以胡塞尔为代表的当代现象学和柏拉图、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样,割裂了先验和经验之间内在的相互建构的关系。它强调“现象学的还原”,把自然看作是作为认识结果的“现象”的内容:感觉材料的来源,而“现象”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来源于这些感觉材料,而是来源于概念化的先验形式,感觉材料的作用在于充实已经具有既定意义和秩序的先验形式。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存在主义的立足点之一,就是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甚至整个现实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归结为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生存和超越。显而易见,这些意义和价值的最终来源就是人的自我意志和精神。至于自然和人的自我意志和精神的关系当然不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而是传统实践意义上的支配和被支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至于当代解释学,我们知道,它们的思想渊源是上述当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人和物性的关系上具有和两者基本相同的态度和倾向。如伽达默尔虽然反对狄尔泰等人的传统解释学的主体性倾向,但是仍然和他们一样认为历史的现实即“理解的历史的视域”是人的精神意志外化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因而具有对人的认识的主动和决定的意义。但他仍然和传统主体性的实践观一样,把实践看作是人的精神的对象化,人对自然的占有,而忽视实践的另一种性质:内化,即自然对人和人的精神的占有。因此,在伽达默尔那里语言符号及其理解、解释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人,而不是自然。从广义上说,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也属于当代解释学,因为他们都是按照基本相同的原则(基于游戏的实践样式反对传统的理性哲学及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语言符号(文本、艺术)进行解构和新的诠释。在人和物性的关系上,按照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等人的说法,后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这种游戏行为是一种符号的“无底盘”的延异即差异化行为。这个“底盘”无疑就是作为符号的价值和意义的最终来源之一的自在的自然和作为符号建构者的主体(人)。语言符号的自律性及其价

值意义的“无根性”使得自然作为符号价值意义的来源不但被遗忘,而且被人性严重挤压和扭曲。这大概就是当代人越来越感到生活无意义,越来越失去家园(意义之根)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吧。

值得重视的是海德格尔后期在其哲学生存论的存在论中对人性和物性关系的深刻反思。

如前所述,在“存在”和“世界性”的问题上,海德格尔虽然承认它们的意义只有和此在即具体的人相联系时才能得到揭示和敞开,也就是说,人和“存在”“世界性”具有一种本质的关系,和古希腊的实践理念一样(人的行为既是利用现实的东西实现一定的目的,又是一种美德的实现。人有责任和能力去保护世界及其万事万物即现实的存在者。)保护“存在”,使“存在”安置下来,并通过语言,去倾听和沉思“存在”。这种倾听和沉思不但是一种真正的行为,而且先于传统意义上的实践和理论的行为;人的本质不在于劳作和“烦神”,利用上手的存在者生产存在者来生存和对社会的介入,而在于对人的“世界性”的领悟和对存在的倾听、安置。人的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实践即精神的对象化并不构成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相反,存在为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现实的意义提供可能性的条件。存在对人的实践的先在和基础性及其人对存在的“思”具有对人的现实实践活动的最原始的意义。

在这里,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意义既不是一种自在自然的意义,也不是近现代实践哲学的人化自然的意义,而是超越两者又和两者密切联系的,它是相对于人的意义的整体,而又不是作为人化自然的存在者的意义的整体。由于海德格尔的实践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践观,而是前苏格拉底的实践观,即把实践看作是一种人对“存在”的理性的沉思,在“存在”和“世界性”的问题上无意或无法实现人与自然、存在和存在者等之间的统一。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不是一种在实践上相互建构的关系,存在的意义既不是来源于人性,也不来源于物性,而是具有实体性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存在及其意义的一定的神秘性。或许我们习惯于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沉思或反思而无法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思”的更深的用心和意义。

我们的实践哲学的理念不同于传统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理念片面强调主观精神的对象化,强调人对自然的占有甚至吞并,而是强调精神的对象化和内化的统一或双向互动和渗透,不但强调人对自然的占有,而且强调人对自然的占有,现实存在的东西既有自然的东西也有精神的东西,现实的意义和价值既来自于精神,也来自于自然;不但人有生命、价值和权利,自然(包括自在自然)也同样有生命、价值和

权利。因为在自在自然的生命和价值不但是人的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和人的生命息息相关,而且它的生命和价值的形成是远比人类的历史悠久得多,比人类社会更有隐秘的深厚的秩序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自在自然的意义和价值远胜于人和人化自然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现代人必须重塑和广大古希腊和中国等传统思想中的“实践智慧”,要意识到在实践,特别是生产劳动的每一步都是对自然的冒险的侵犯和破坏。例如,古希腊思想中的“逻格斯”和“奴斯”就是一种存在于整个世界中的客观精神,人和自然都是这种宇宙精神的创造物,因而是平等的、和谐一致的。中国古代思想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的自然的和谐相处,印度佛教,特别是中国化了的禅宗强调大千世界充满生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平等一如,一草一木总关禅意。在一种体悟和洞见的思维方式的作用下,人应该认识到自然和人在这种客观精神中是一体的,它们同样是有生命和价值的东西,都有权受到尊重和保护。当然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典型的“种胎式”的实体哲学,其“道”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宇宙精神或非人格的创世神,不但通过自我生发创造世界,而且其精神和意志周遍宇宙万物,是它们的存在及其意义的最终根源,但人和其他事物的行为并不与

“道”产生互动和建构,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其人性是不会有根本的变化的,变化的只是一定的形式,就像动植物的种胎一样,人的道德修行的意义在于为这种人性种胎提供一种生长的环境,以获得一定的道德成果。换言之,传统的道德修行只是在实体性的人性的基础上对善和恶的加减行为,人的修行对人的本性并不构成建构性的意义。佛教中的“阿赖耶识”就是指人的日常思想行为日渐在人的心中积淀下来,形成一种对以后的行为和命运产生决定性作用的“种子”一样的意识内核。

当然,像海德格尔那样“搁置”和排斥人化自然对“存在”的意义的构成既不是现实的,也不是合理的,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化自然和人性的膨胀是一种既定的事实,必须直面它;另一方面,在人化自然中,既然包含着自然对人的占有和人性的建构,包含着人对自然的占有和建构。从伦理的角度讲,人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当下的、历史的、个人的、社会的)负有责任,渗透着人的精神意志的人化自然是人的生命和本质的一部分,对自在自然的非人格的生命和人化自然中的客观化了的人格应该采取认可、尊重甚至某种程度的敬畏的态度。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Materialized Substantiality and Humanity in Modern Philosophy

MENG Xian-q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Some western scholars argue that the lack of life significance is essentially due to the inflation of the tool logos. An important source that has caused such a spiritual situation of the society is that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antitheses of the duality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ttributes the value significance of things only to human, the absolute subject, ignores the value of the Nature itself or the “civilized nature”, such a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Aristotle’s “Theory of Material Formalization”, etc. Comparatively, Marxist practice philosophy holds that all the social practice, including moral sens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production, are characterized as the mutual amalgamation and pervasion; these are actually paired subject and object. So language communication results in labor production, and both language and production have created “humanized/civilized nature” and “naturalized man”. These are the real sources w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arthly world.

Key words: entity ontology; practice philosophy;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 孟青]